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

——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

[日] 弓场纪知

内容提要 福斯塔特是9—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工商业贸易城市,兴盛始于法蒂玛(Fatimid)王朝,终止于马木鲁克(Mamluk)王朝。该遗址大量出土的东亚陶瓷器,是展现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贸易的重要资料,20世纪以来受到欧美及日本的中国陶瓷研究者的密切关注。以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长谷部乐尔为首的出光美术馆调查团曾于1964年调查了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其成果见诸于三上次男著作《陶瓷之路》。1998—2001年间,长谷部乐尔率领的出光美术馆、中近东文化中心调查团对这个遗址出土的一万两千余片中国、越南、泰国及日本陶瓷进行了调查,作者全程参与,并在法国和英国的东洋陶瓷学会上进行了成果发表。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陶瓷中,中国陶瓷占3%,都是质量极高的产品。尤其是约2800片13—14世纪的青花瓷和龙泉青瓷,是蒙古帝国与伊斯兰世界陶瓷贸易的重要证据。

关键词 福斯塔特 中国陶瓷 伊斯兰世界贸易

一 引言

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与商贸联系肇始于公元之初。商品、人群和语言的交流对东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双向影响,极大地激发了东西方文化、艺术和手工艺的发展。然而,随着九世纪海路贸易的发展,丝绸之路贸易也发生了剧变。满载着东西方手工艺品(东亚的陶瓷、西亚的棉织物、玻璃和金属器)的船舶频繁往来于印度洋之上。遍布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城镇迅速发展成繁忙的商港^{〔2〕}。

公元七世纪的阿尔—福斯塔特已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商业城市。福斯塔特遗址位于尼罗河畔,在现代开罗城郊的老开罗区。今天的福斯塔特遗址沉寂于一片废墟之中,往日的繁华盛况早已湮没无存〔图一〕。

* 原稿登载于《东方陶瓷学会通讯》第76卷,页1-17,2011-2012年。Yuba Tadanori, "Chinese Porcelain from Fustat Based on Research from 1998-2001",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76,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11-2012, pp.1-17.

〔2〕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东京,1969年。

二 阿尔-福斯塔特遗址及其出土中国陶瓷器调查发掘简况

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始于20世纪初。1920年之前，埃及政府古物部的阿里·巴哈噶特(Ali-Bahagat)在此主持了为期十年的发掘工作。二战之后，法国、美国和日本的研究团队加入埃及专家的行列，至今尚有一系列合作项目仍在进行之中，发掘出土了逾一百万件器物。其中包括

一系列低温陶器、高温陶瓷器、玻璃器、油灯、石器和窑具等。出土器物存放在福斯塔特遗址区的库房内。在所有出土文物之中，来自中国及其邻国的陶瓷器共计一万余件，为东亚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陶瓷学者率先开展了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器的细致研究，例如奥斯卡·拉斐尔(Oscar Raphael,1874-1941)⁴¹，R.L.霍布逊(R.L. Hobson,1873-1941)⁴²以及利·阿什顿(Leigh Ashton, 1897-1983)⁴³等。1934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1900-1975)就福斯塔特遗址出土品中的“富凯藏品”(Fouquet Collection)作了报道⁴⁴。二战之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俞博(Bo Gyllensvärd, 1916-2004)在斯德哥尔摩发文介绍了馆藏福斯塔特出土中国陶瓷的情况⁴⁵。三上次男(1907-1987)也在一系列出版物上频繁发表关于福斯塔特陶瓷的研究成果⁴⁶。

1964、1966两年，受埃及政府邀请，由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率领的出光美术馆团队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全面的调查⁴⁷，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拣选工作，学者们从库房里数以百万计的碎瓷片

〔图一〕阿尔-福斯塔特遗址



〈1〉 O. C. Raphael, "Fragment from Fustat",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3, 1924, pp.17-25.

〈2〉 R. L. Hobson, "Chinese Porcelain from Fostat",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61, No.354, 1932, pp.108-13.

〈3〉 L. Ashton, "China and Egypt",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11, 1934, pp. 62-72.

〈4〉 这些瓷片现存于日本仓敷市大原美术馆。

〈5〉 B. Gyllensvärd,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ostat 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45, 1973, pp. 91-119. B. Gyllensvärd,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ostat 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47, 1975, pp. 93-117.

〈6〉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东京，1969年；[日]三上次男:《三上次男著作集1·贸易陶瓷史研究·上》“东亚、东南亚”篇，东京，1987年；[日]三上次男:《三上次男著作集2·贸易陶瓷史研究·中》“南亚、西亚”篇，东京，1987年；[日]三上次男:《三上次男著作集3·贸易陶瓷史研究·下》“中近东”篇，东京，1988年。

〈7〉 调查队成员包括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长谷部乐尔、蓑丰、杉村栋。

中挑选出中国陶瓷。调查结束之后，埃及政府赠予出光美术馆154件中国陶瓷片，现展陈于出光美术馆陶片资料室¹⁾。这批捐赠瓷片的年代从唐代到清代，是此前福斯塔特出土品中质量最上乘的一批材料。

1978年到1985年，早稻田大学、出光美术馆和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联合组队，在福斯塔特遗址开展了进一步的发掘²⁾。这次发掘出土了约十万片伊斯兰陶瓷、868片中国白瓷、青瓷及青花瓷。1981年，以这次特殊的发掘工作为出发点，就同一时期的中国陶瓷与埃及窑址产品之间的关系，三上次男在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发表了题为《福斯塔特：中国与埃及》的演讲³⁾。

值得注意的是，早年间发掘记录中没有提及出土状况，导致我们无法确切获悉大多数瓷片的具体出土地点。虽然1978-1985年间的调查报告也不够详尽，但我们仍能够从中窥见些许线索。根据报告，福斯塔特遗址可分为四个地层：第一层、第二层、地基层和岩石层，其中地基层的年代最早。第二层的年代范围是900-1349年；第一层从1349年到现代。一般认为1349年黑死病之后福斯塔特被彻底废弃。我们由此可以推测第二层应该是持续使用的地层。第二层可分为早期(10至11世纪)和晚期(13至14世纪)两个阶段。早期地层主要出土白瓷，晚期则以青瓷为主。

在这次特别调查中，10世纪与11世纪的出土物主要是广东和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和越窑系的青瓷；十三四世纪的出土物则主要是龙泉青瓷，大致与过去的发现相吻合。根据1978—1985年的调查，80%以上的陶瓷片来自最上层，即第一层，20%的来自第二层。库房里保管的陶瓷器和其他种类的日常用器大部分出土于第二层。福斯塔特城建于7世纪，14世纪被摧毁之前一直不断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日用器物不断被丢弃，并大量留存下来，形成了现今的堆积。

1995年，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的川床睦夫与埃及政府古物部联合，开始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所有文物进行综合编目。该项目致力于对福斯塔特器物库房的所有藏品共计逾百万件器物进行大致分类。目标是对每件器物都进行清洗、分类、整理和调查。将藏品大致分为陶瓷器、玻璃器和过滤器等类别进行操作，清洗工作直到2000年才结束。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来自近东、欧洲和东亚地区的数个国家。根据年代和来源，分门别类收纳在50厘米见方的纸箱里⁴⁾，兹统计如下：

伍麦叶王朝(Umayyad, 661-750年)	6箱；
阿拔斯王朝(Abbasid, 750-1258年)	9箱；

〈1〉 出光美术馆：《陶瓷的东西交流——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陶瓷》，东京，1984年；[日]小山富士夫：《关于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陶瓷片》，见出光美术馆：《陶瓷的东西交流——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陶瓷》，页73—83，东京，1984年。

〈2〉 [日]櫻井清彦、川床睦夫：《阿尔·福斯塔特：埃及伊斯兰都市发掘调查1978-1985》，东京，1992年。

〈3〉 Mikami T., "China and Egypt: Fustat",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45, 1981, pp.67-89.

〈4〉 [日]弓场纪知：《元代的陶瓷器》，见[日]海老根聪郎、西冈康弘：《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卷7·元》页281—297，东京，1999年；[日]弓场纪知：《青花之路：中国陶瓷器所讲述的东西交流》，东京，2008年。

拉斯特彩陶器(Lustre Ware,来自埃及、伊拉克和西班牙)	508箱;
法蒂玛王朝(Fatimid, 969-1171年)	885箱;
阿尤布王朝(Ayyübid, 1169-1250年)	27箱;
马木鲁克王朝(Mamluk, 1250-1517年)	1677箱;
突尼斯陶器	5箱;
土耳其陶器	41箱;
意大利陶器	24箱;
西班牙陶器	2箱;
欧洲瓷器	44箱;
东亚陶瓷器(包括中国、越南、泰国、柬埔寨和日本)	111箱;
仿中国陶瓷器	119箱;

陶瓷器共计3518箱，每箱装有100片，故总计约合35万片。东亚陶瓷有111箱，其中装有约1万1千片陶瓷碎片，约占陶瓷器总量的3%。

笔者于1998至2001年间参加此项目，并于每年一月到二月，即当地的斋月期间在福斯塔特工作一个月。此次调查的领队是长谷部乐尔，队员包括手塚直树和笔者〔图二〕。笔者主要负责分类、调查和拍照，以及对东亚陶瓷进行测量，所谓东亚陶瓷，主要是中国产品。我们研究的对象包括1964年和1966年出光中东调查团归类为中国陶瓷的标本，还有一部分此前被误认为是伊斯兰陶瓷，但这次发现是中国陶瓷，因而将其分离出来。这次清点的总数为12705片。这个数量比1964和1966年所定的9901片多了2804片。

〔图二〕长谷部乐尔拣选陶瓷片(1998-2001)



此项目期间，我们所调查的东亚陶瓷的分类统计结果如下(括号中是1964-1966年调查的结果)^{〔1〕}：

越窑青瓷	941片(673片);
邢窑白瓷	2069片(1002片);
龙泉窑青瓷	2394片(964片);
长沙窑青瓷	8片;

〔1〕 [日]小山富士夫：《关于埃及福斯塔特出土中国陶瓷片》，见出光美术馆：《陶瓷的东西交流——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陶瓷》页73-83，东京，1984年。

耀州窑青瓷	25片；
白釉绿彩陶器	5片；
磁州窑陶器	6片；
元青花瓷	298片(191片)；
明青花瓷	1419片(1651片)；
明五彩瓷	36片(3片)；
清代瓷	5408片(5250片)；
越南、泰国陶瓷	91片；
日本瓷	5片(2片)。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库房中保管的所有东亚陶瓷器，自1911年以来发掘出土的陶瓷器都在此处，甚至包括福斯塔特遗址以外遗迹的出土物，已归类的有8024箱，尚有2000箱未行分类，可能这2000箱里还包含有中国陶瓷，但我们认为在总量中不会占特别大的比例。归类好的瓷片装在袋中，存入新的库房。

三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器分析

(一) 唐至五代时期的中国陶瓷

福斯塔特城兴起于图伦王朝(Tulunid, 869-905)和伊赫什德王朝(Ikshid, 931-969)时期，通过与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频繁交流，逐渐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出土物中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国陶瓷有40片，其中包括邢窑白瓷〔图三：1〕、越窑青瓷〔图三：2〕、长沙窑青釉铁绘器〔图三：4〕和巩义窑白釉绿彩陶器〔图三：3〕。所有这些标本的年代都始于9世纪，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都不早于这个阶段^{〔1〕}。

这一时期的中国陶瓷在伊拉克的萨马拉(Samarra)和尼沙布尔(Nishapur)都有出土，但数量不大。同类唐代陶瓷片和同时期的伊斯兰陶片也见于江苏省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物，扬州是当时中国的商贸重镇，这也说明东亚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贸易可能兴起于9世纪。模仿越窑青瓷而制作的绿釉陶器在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这类器物证明伊斯兰世界仿制中国陶瓷可能始于9世纪。

10片长沙窑青釉铁绘器和7片白釉绿彩陶片是唐代销往伊斯兰世界的陶瓷器的重要例证。就后者而言，据杰西卡·罗森报道，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出土过类似产品^{〔2〕}。这类陶器在萨马拉和扬州都有出土^{〔3〕}，

〔1〕 据称有若干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唐三彩盘和凤首壶收藏于意大利法恩莎国际陶瓷美术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 in Faenza, Italy)，但这些材料应该与福斯塔特出土物区别对待。参见〔日〕三上次男：《三上次男著作集2·贸易陶瓷史研究·中》“南亚、西亚”篇。

〔2〕 J. Rawson, M. Tite and M.J. Hughes, "The Export of Tang Sancai Wares: some recent research",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52, pp.39-62.

〔3〕 〔日〕弓场纪知：《扬州—萨马尔拉：晚唐时期多彩釉陶器、青花白瓷相关考察一则》，《出光美术馆纪要》第三号，东京，1997年。

〔图三〕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唐至五代时期的中国陶瓷



产自河南巩义窑，9世纪时发展出专供伊斯兰市场的品种¹⁾。

（二）北宋时期的中国陶瓷

北宋时期，埃及法蒂玛王朝(909-1171)使用的中国陶瓷数量剧增，这个时期是福斯塔特城的鼎盛期，它取代阿拔斯王朝的名城萨马拉，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东西方海上商贸的中心。

福斯塔特出土的越窑青瓷质量上佳。除了素面无纹饰的瓷片之外，还有许多带有精美刻划花的鸂鶒纹、凤纹和龙纹〔图四：1、2〕，这些瓷片的年代范围在五代至北宋初年之间。带莲瓣纹的瓷片始于北宋早期。有人认为这些青瓷产自浙江省寺龙口窑址²⁾。此类瓷片一共有941片，同类越窑青瓷片尚未见出土于环印度洋地区的其他港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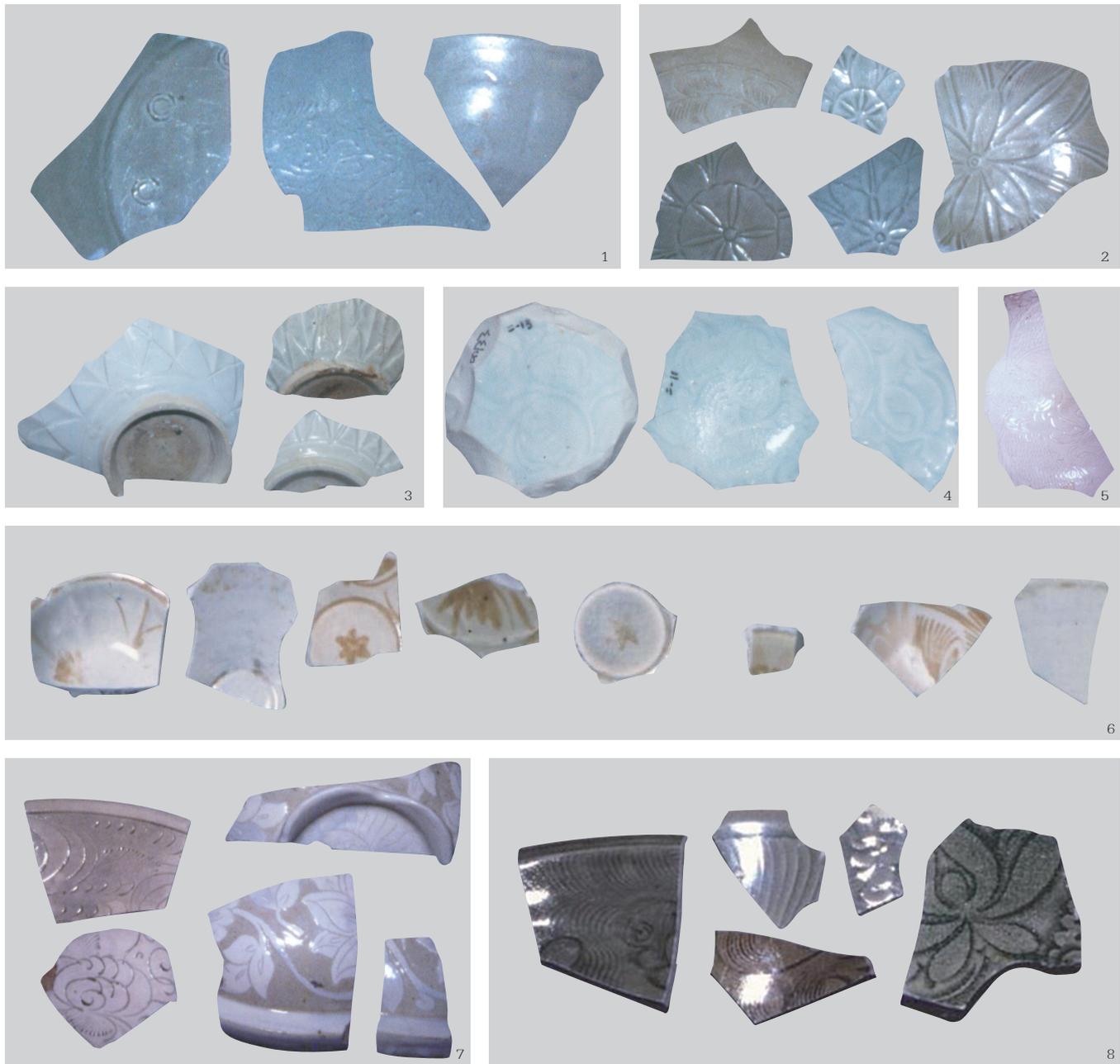
白瓷包括四种。其中外壁刻有莲瓣纹的白瓷片，有人认为是广东省西村窑和潮州窑的产品，年代在11世纪前半〔图四：3〕，这类白瓷还在安徽繁昌窑、菲律宾、苏门答腊岛等遗址出土过³⁾。另有300片典型的景德

〈1〉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黄治唐三彩的考古新发现》，第73卷，奈良，2006年；陆明华：《早期白釉绿彩陶瓷器的初步研究》，《陈昌尉纪念论文集》第五册，2011年。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3〉 E. P. Edwards McKinnon, "Oriental Ceramics Excavated in North Samarra",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41, 1977, pp.59-120.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Oxford, 1993.

〔图四〕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北宋时期的中国陶瓷



镇青白瓷〔图四：4〕，年代始于12世纪。

定窑风格的白瓷仅有一片〔图四：5〕，带有“官”字款^①。另有70件白瓷片在釉上以拉斯特彩绘制植物纹样，可能是11世纪广东的产品。其中包括直径约20厘米的碟、盘的碎片。内壁绘有笔触纤细的橙色拉斯特彩

① 早稻田大学工作队曾经发掘出土过一片带有龙纹的白瓷。可能是定窑产品，不过尚未确认。参见〔日〕樱井清彦、川床睦夫：《阿尔·福斯塔特：埃及伊斯兰都市发掘调查1978—1985》，东京，1992年。

蕨类植物纹样，在颜色和纹样上都与装饰有拉斯特彩的伊斯兰陶器截然不同〔图四：6〕，釉上拉斯特彩可能是在埃及或者中国绘制的¹⁹。这类器物目前仅见于福斯塔特遗址，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另外还有数十片磁州窑和耀州窑的陶瓷片〔图四：7、8〕。这类北宋器物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和苏门答腊都有出土，在广州也有集中出土。它们应该是既供出口，也供中国国内市场使用的产品。

〔图五〕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南宋时期龙泉青瓷



（三）南宋时期的中国陶瓷

福斯塔特出土物中包括十二世纪晚期到十三世纪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是阿尤布王朝(Ayyūbid, 1169-1250)时期使用过的器物。不过数量要比11世纪时期少得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印度洋贸易的衰落。相关出土物中有数十件典型的南宋时期素面或者莲瓣纹纹的龙泉青瓷〔图五〕。

（四）元代中国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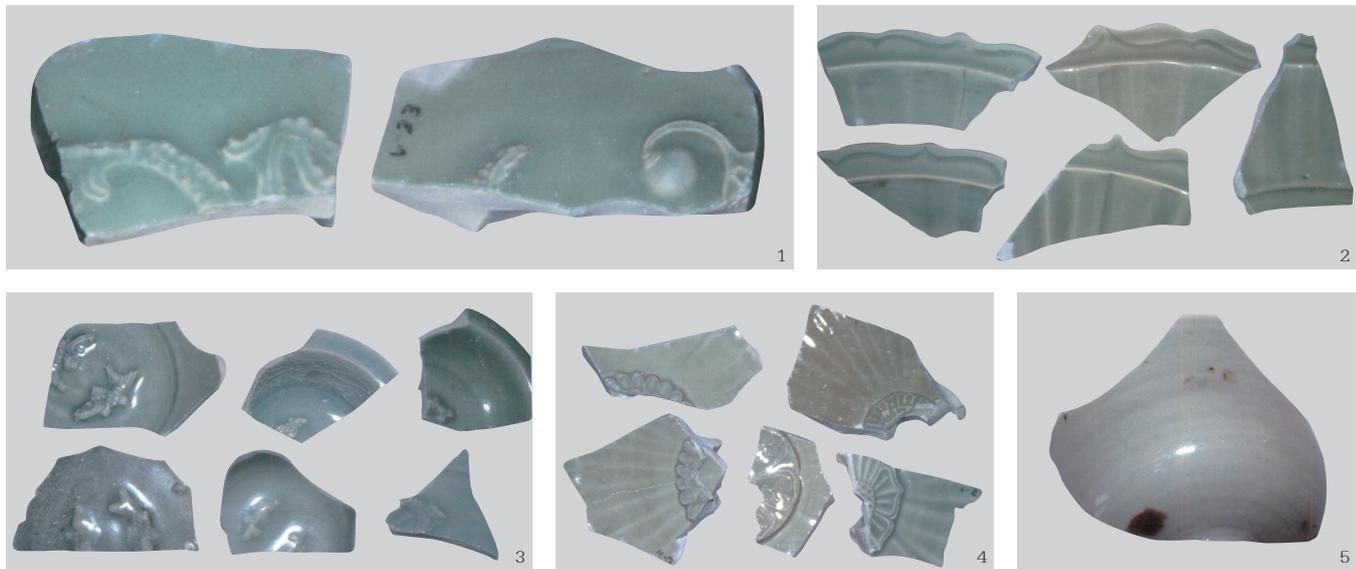
1168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福斯塔特沦为法蒂玛王朝焦土战术的牺牲品，化为一片废墟。不过在阿尤布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Mamluk, 1250-1517)期间，福斯塔特再次掌握了印度洋贸易的霸权，受惠于香料贸易，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大发展阶段。

福斯塔特遗址大量出土属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和东南亚陶瓷，其中最重要的是龙泉青瓷，在福斯塔特库房中一共有2400片，大部分的年代属于元代。器类主要包括碟、碗、盘、大碗、大盘，还有一些壶、瓶、香炉和高足杯。可见装饰方法的标本包括内底模印龙纹和双鱼纹的碗〔图六：1、3〕、刻划莲瓣纹的大盘与碟〔图六：2〕、内底贴塑菊花的大碗〔图六：4〕和素面无纹饰的碗，还有一片带铁褐彩斑点(日本称“飞青磁”，〔图六：5〕)。托普卡比博物馆里收藏有许多件类似的器物，有可能是从福斯塔特输入的。13和14世纪时，龙泉青瓷是印度洋地区陶瓷贸易的支柱产品。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收藏1350件龙泉青瓷，远多于40件元青花瓷器²⁰。福斯塔特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马木鲁克王朝时期仿照龙泉青瓷制造的青釉陶器，托普卡比博物馆库房中共藏有

〈1〉 [日]弓场纪知：《扬州—萨马尔拉：晚唐时期多彩釉陶器、青花白瓷相关考察一则》，《出光美术馆纪要》第三号，东京，1997年。

〈2〉 R.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aplete Catalogue 1*, London, 1986.

〔图六〕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元代龙泉青瓷



〔图七〕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景德镇产至正型元青花



1677箱马木鲁克朝的陶器，几乎每箱中都有青釉陶，说明龙泉窑瓷器对当时的埃及陶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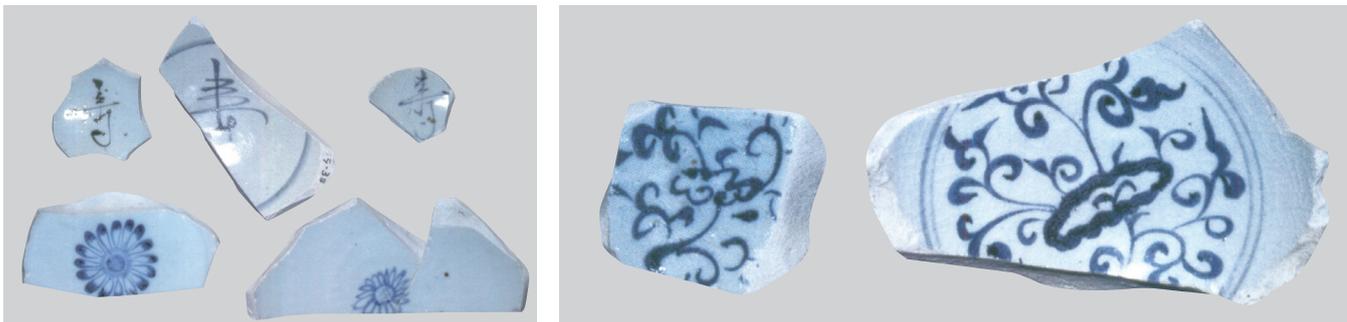
元青花瓷有约300片，主要有两种类型：典型的景德镇式样以及简笔纹饰类型。单独出土了一片红釉瓷，但未见釉里红。至正风格的元青花包括大盘、大碗、盘、碗等，纹样包括龙纹、凤纹、莲池水禽纹、束莲纹和阿拉伯式纹样，以优质钴料绘制〔图七〕。在托普卡比博物馆、伊朗西北的阿尔德比尔陵寺^{〔1〕}及德里的图格拉克宫遗址中也有类似产品^{〔2〕}，这些高质量的元青花瓷片很有可能是来自蒙古帝国的赠礼。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简笔装饰元青花的资料尚未发表。此类器物有200多片，内底在釉下绘有“寿”字、菊纹或云气纹〔图八〕。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都出土过非常相似的标本。相比起至正型元青花而言，其质量较次。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品中不见此类，究其原因，很可能因为奥斯曼帝国仅择选高级昂贵的青花瓷器。

〔1〕 J.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C,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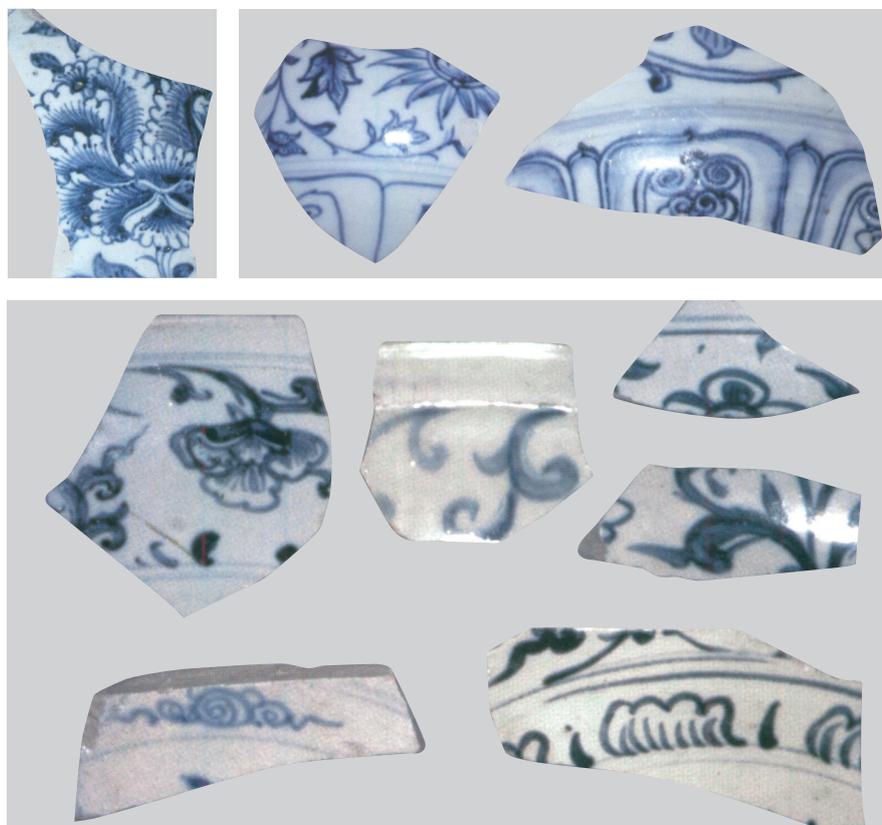
〔2〕 E. S. Smart, "Fourteen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41, pp.199-230.

〔图八〕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筒笔装饰元青花



福斯塔特也进口越南陶瓷器，出土了约100片此类器物，多数都是釉下蓝彩，也有数例五彩、白釉或者黑釉的残片〔图九〕。此外还有数枚来自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地区的陶瓷片，年代属于14世纪至16世纪。最早的是14世纪后半叶的青花瓷，比著名的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带1450年纪年铭文的安南瓶还要早一些。西奈半岛的阿尔—图儿(Al-Tur)位于通往福斯塔特的路线上，此地出土过16世纪的越南陶瓷和中国陶瓷^{〔1〕}。

〔图九〕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南青花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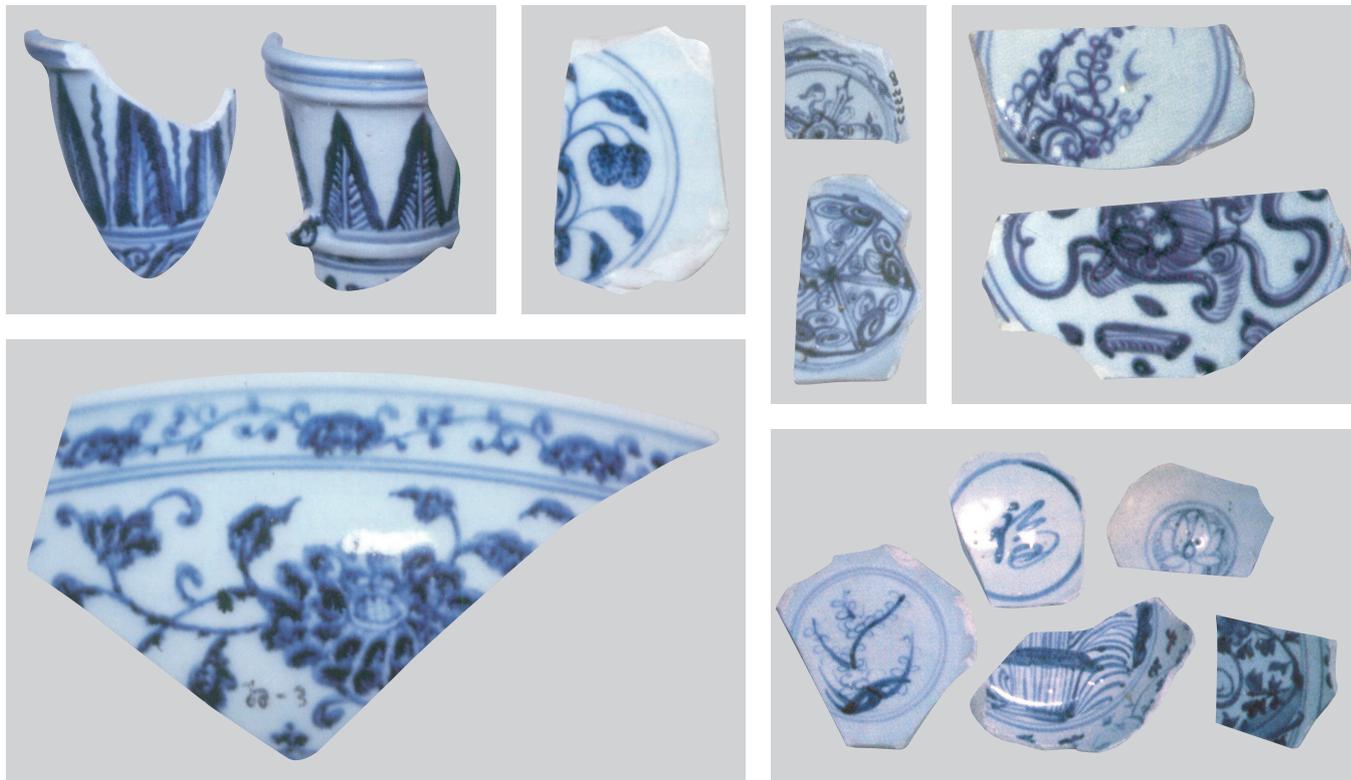
（五）明代中国瓷器

1347—1349年间，黑死病席卷了福斯塔特并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自此之后该城再未恢复元气，学者们认为它变成了开罗的“垃圾场”。不过，基于福斯塔特出土的1万2千余件瓷片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明清时期的陶瓷，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陶瓷在明清时期仍在持续销往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出土的几乎所有明代陶瓷都来自景德镇，还有少量可以确认来自漳州窑和德化窑(白瓷和青花瓷)。景德镇陶瓷的标本从年代上分属于15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三个时期。

〔1〕 中近东文化中心：《图儿遗址发掘调查概要》，东京，1995年。

〔图十〕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15世纪景德镇青花瓷



15世纪的青花瓷有60片。与元青花瓷相比，这个数量可谓极少。15世纪的瓷片年代从永乐(1403-1424)到弘治(1488-1505)年间，器类包括盘、碗、扁壶，虽然数量少，但质量却比较上乘〔图十〕。托普卡比博物馆藏有85件明代青花瓷，远少于元代青花瓷的数量。这种现象与明代的海禁有关系，海禁严重限制了中国货物的出口，罗珊娜·布朗(Roxanna Brown)将这个阶段称为“明代空白期”^{〔1〕}。

到16世纪，销往开罗的中国陶瓷才显出复苏的迹象。这个时期常见的器类是餐具，如直径20厘米的盘、碟等，多产自景德镇观音阁，釉下以蓝彩绘制山水、花鸟、莲池、海螺和金刚杵等纹样〔图十一：1、3〕，这类瓷片有约800件。类似的青花瓷在日本和东南亚大量出土，随着16世纪前期海禁的解除，陶瓷贸易又达到了新的高峰。与青花相比，五彩瓷片数量较少，但有数枚民窑产的“金襴手”和一些“古赤绘”类型的五彩瓷〔图十一：2〕。这种高级瓷片外销的目的地可能是奥斯曼帝国的都会伊斯坦布尔。

17世纪的青花瓷有350片。大部分是克拉克瓷和转变期青花瓷，数量相对较少〔图十一：4〕。17世纪是海上扩张的时代，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荷兰，相继控制了中国的陶瓷贸易，这一时期同时是印度洋贸易的衰落时期。约有30片来自福建漳州窑的五彩瓷和青花瓷——这种陶瓷在伊斯兰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时期的伊兹尼克陶器(Iznik pottery)、屈塔希亚陶器(Kutahya pottery)、西班牙陶器和环地中海地

〔1〕 R. M. Brown,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s a Chronology of Thai Trade Ware*, Bangkok, 2009.

〔图十一〕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



区的陶器开始与中国陶瓷一起销入埃及。

（六）清代中国陶瓷

奥斯曼帝国晚期，开罗城的行政中心转移到现代开罗市中心，城里用至破损的中国陶瓷器被丢弃到福斯塔特。据统计，出土清代瓷片约5400件，占福斯塔特库房储存陶瓷片总量的45%，种类包括青花瓷、五彩瓷、粉彩瓷、中国伊万里瓷和单色釉瓷（蓝釉、绿釉、黄釉、褐釉和天蓝釉等）。值得注意的是，福斯塔特出土的大多数清代瓷片年代都在18世纪中期以前，从清末开始，实际上已不见景德镇瓷器的踪影了。

青花瓷数量极多〔图十二：1、2〕，相比而言五彩瓷和粉彩瓷极少〔图十二：3〕。青花瓷大多数属于康熙年间（1661-1722）。咖啡杯占的比例特别高，有的带有“大清康熙年制”款识，或带有作坊标识。中国伊万里瓷包括两类：仿制彩绘伊万里瓷（日本称“色绘伊万里”）和仿制釉下金蓝彩的伊万里瓷（日本称“染锦手”）〔图十二：4〕。在托普卡比博物馆中有许多相类瓷片，该馆中还藏有逾800件日本伊万里瓷，但福斯塔特仅发现约10枚日本伊万里瓷片。绝大多数单色釉瓷片都是咖啡杯。有些瓷片上带有卷涡纹、花鸟、山水和花篮等纹饰，还有一些以金线描写古兰经文，这类瓷器肯定大量供销伊斯兰世界的咖啡室。

〔图十二〕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清代中国陶瓷



四 结论

本文主要概述了1998年到2001年间福斯塔特遗址发掘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情况。从中可知，从9世纪的晚唐到18世纪初的清早期，中国陶瓷持续销往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商贸中心福斯塔特，其过程延绵逾千年。

目前发掘工作尚未终止，考古发现的数量仍在增加。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陶瓷仅占陶瓷发现总量的3%，但这个比例在将来也会发生变化。不过，中国销往福斯塔特的陶瓷质量都相当上乘，在陶瓷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无疑在伊斯兰世界的市场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黄珊译）

[作者单位：日本东京石洞美术馆]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